

“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研究： 回顾、反思与展望

刘礼堂 冯新悦

摘要 近三十年来,有关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在古道时空范围的界定、古道商贸活动及其衍生问题、古道相关的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也暴露出研究不够系统和规范、在地域和时段上出现断裂、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壁垒等问题。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在新时代的发展,需要采用“一带一路”的新视野,建立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运用以文献整理为核心、多学科综合的新方法,如此方能凸显古道的价值与意义,提升研究的水平与格局。

关键词 “一带一路”;西南茶马古道;文献整理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3-007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229)

西南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涉及茶、马、丝、盐、铜等大宗商品,沟通了汉、藏、羌、彝、蒙等几十个民族,汇集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文明,为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三十年来,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近三十年来古道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研究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就该研究领域所需要的新视野、新思维和新方法问题进行探讨,以冀推动西南茶马古道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文化寻根”热潮的兴起和地方史研究的兴盛,西南地区的文化学者开始走向田野,寻找和研究本地历史文化遗产,从而发现了一条连接内地与藏区的古代贸易通道。1988年,木霁弘在《中甸汉文历史资料汇编》的序言里将这条古道命名为“茶马之道”^[1](P2);1990年,木霁弘、李旭等六人(后来被学界称为“茶马古道六君子”)走访了马帮路线,并于次年以笔名在《云南大学学报》发表《超越——茶马古道考察记》,在这篇文章里首次使用了“茶马古道”^[2](P4)一词。1992年,“六君子”又结合自己在走访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写成《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绘制了滇藏、川藏两条茶马古道的路线图,将茶马古道视为“滇、藏、川大三角”的文化纽带^[3](P11),为茶马古道研究赋予了文化价值。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就此拉开序幕。

早期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存在依附于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倾向,这是因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提出和研究起步较早,经过伍加伦、江玉祥、蓝勇、段渝等学者的探索,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越发意识到西南茶马古道的独立性,使之从南方丝绸之路框架下剥离出

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探讨了西南茶马古道在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历史作用,强调了该路线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将其与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并列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4](P59-64)。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对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和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分析,进一步突出了古道研究的重要性^[5](P49-57)。孙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几个问题》指出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无论是在路线上还是货物种类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6](P74-85)。此外,学界还围绕西南茶马古道相关研究召开了“茶马古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等多场学术会议,王士元、王明珂等学者牵头出版了《茶马古道研究集刊(1~4辑)》等一系列专题论文集。在相关学者的不懈努力下,西南茶马古道研究的学术地位逐渐得到了确认。

回顾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西南茶马古道时空范围的界定。由于古道时空界定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学界的认识一直处于不断丰富、深化过程中,这一基础议题贯穿了近三十年来的古道研究,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

时间范围上,由于明清时期和近代早期的资料相对丰富,资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古道研究主要聚焦于这两个时段。近十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古道的时间上限已经推进到隋唐时期。孙华认为,隋唐时期的西南茶马古道已经是唐蕃贸易的重要通道,唐玄宗时期的赤岭互市是广义的茶马古道的开端^[6](P74)。宋时磊的研究显示,唐人借助茶叶的流通体系,将这一通道逐渐纳入内地的经济贸易网络,加速了边疆社会对中原的文化体验和认同^[7](P122-133)。张海超指出,南诏大理国也曾将生活在今云南茶叶产区的诸多民族置于统一管辖之下,通过将茶运往藏区和东南亚地区,维持了当地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稳定^[8](P110-117)。陆离对宋代相关史料的挖掘则显示出,曾繁荣于唐代的青藏茶马古道在宋时依旧活跃,并且留下了茶马贸易的确凿记载^[9](P34-41)。在上述学者的梳理下,西南茶马古道在隋唐宋元时期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不过,贸易大通道并非产生于一朝一夕之间,因此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寻找古道的更早证据。杨海潮根据茶文化传入西藏的时间,将古道起点上溯至东汉^[10](P111-115);赵国栋则认为,2016年在西藏阿里发现的古茶叶遗存表明,西藏在“古象雄时期就已经与内地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茶叶往来”^[11](P102)。这些研究无法直接论证古道在隋唐以前的存在和运转情况,却让学界对古道的历史渊源有了更深的了解。

空间分布上,学界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线到网络化、从狭义到广义、从云南向周边不断拓展的过程:木霁弘等人在概念产生之初指出茶马古道有滇藏、川藏两条主要线路,后来又补充加入了青藏线,但仍然强调滇川藏“文化三角”的中心地位^[12](P180-181);李刚等人则以不同线路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依据,指出茶马古道共有陕甘、康藏、滇川三条线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交易网络^[13](P113);张洁认为有甘藏、川藏、滇藏三条线路,且各线路随着茶马贸易的变化有所兴替^[14](P176-187);凌文锋认为茶马古道除了三条主干道之外,还存在复杂的支线网络结构^[15](P6-7)。不过,“茶马古道”概念所涵盖的空间范围的扩大,一方面使学界的视野逐渐拓展,人们对古道历史全貌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却也使这一概念面临过度扩张、失去明确内涵的危险。一些学者提出了“北方茶马古道”^[16](P117-121)等概念,将远至我国东北地区以及中亚、欧洲等地的商道全都纳入进来,造成了只要是涉及茶叶和马匹的古代贸易通道均可被冠以“茶马古道”名号的局面。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提出“西南茶马古道”的整体框架概念,将茶马古道限定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线和众多支线组成的,连接内地和藏区、延伸至南亚的古代交通道路系统^[17],使之既具有丰富的内涵,又具有相对明确的边界。

二是西南茶马古道商贸活动及其催生的人口、族群与文化问题。其中,关于茶马互市的讨论肇始于民国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受到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此成果也较为丰厚,国内如黎世衡、竟凡、李光璧等人对西南地区的茶马贸易颇为关注;国外如日本学者佐伯富的研究也涉及宋代茶马贸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有关茶马贸易的讨论更加深入。关于隋唐宋元时期的茶马贸易,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宋代,贾大泉分析了西川地区同吐蕃等民族的茶马贸易情况^[18](P48-58, 114),陈泛舟则

考察了陕甘地区的茶马贸易^[19](P40-43)。就明清时期而言,武沐等人就明代茶马贸易的发展阶段、私茶兴起的原因、茶马贸易体制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考察^[20](P137-144,215-216),陈海龙对官营茶马贸易在清代的衰亡问题展开了分析^[21](P66-71)。这些成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不同时代的茶马贸易情况,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对茶马贸易的认识。

西南茶马古道不仅是贸易线路,也催生了与之相关的人口、族群与文化现象。在这方面,李旭的马帮文化研究^[22](P42-44),汤开建的安多吐蕃部落研究^[23](P31-121),周智生的“藏客”研究^[24](P31-39),杨福泉的“房东伙伴”研究^[25](P1-7,17),均围绕与古道相关的人口和族群展开讨论,是文化研究的典型代表;张科对藏传佛教和安多区域史的考察^[26](P42-44),笔者对云南丙中洛乡的个案分析^[27](P53-56),则揭示了古道沿线民族宗教的互动情况。此外,石硕进一步指出,西南茶马古道作为沟通中原腹地与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通道,为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融合、推动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5](P49-57)。

三是与西南茶马古道相关的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研究。早期的古道研究多基于传世文献资料和民间口头文献资料,近十多年来,随着考古学界和文化遗产学界的介入,实物资料在这一领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2009年甘肃陇南康县“巡按陕西监察”残碑的发现,2011年西南茶马古道川藏线“新添一冷碛”段遗迹的调查,2016年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群遗址茶叶遗存的认定,无论是在时间、空间上还是在细节面貌上都丰富了古道的内涵。关于古道相关遗产的研究、保护与开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木霁弘《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线路》一书对古道文化遗产线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28];杨福泉则从文化保护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古道文物保护、村落保护、口述资料抢救等问题^[29](P57-61);王丽萍将西南茶马古道视为文化线路和廊道遗产,试图在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下进行遗产保护分析^[30](P26-29)。此外,喇明英等人的《四川茶马古道路网系统及其文化与旅游价值探讨》^[31](P158-161)、袁晓文等人的《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及开发中的民族问题研究》^[32](P56-58)、李飞等人的《我国廊道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以滇、藏、川茶马古道为例》^[33](P136-140)等成果针对西南茶马古道的遗产开发利用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当年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上界定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范围,指出了当前保护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三方面保护思路和五大工作要点^[34](P66-72),为古道的研究绘制了具有体系性的文化遗产学蓝图,进一步拓宽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路径。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目前研究西南茶马古道的论文、专著已有上千种,研究内容涵盖古道概念、时间范围、空间分布、线路走向、商贸结构、商品运输方式、商帮及其组织形式、沿线人口迁徙与族群互动、文化交流与传播、古道价值与意义、遗产保护与开发等多个层次。

不过,近三十年来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古道的研究一直不够科学、系统、规范,学术探索往往与地方政府和文化产业界对旅游开发的推动纠缠在一起,导致相关研究呈现出一定的游记化、感性化倾向。其次,研究在地域上、时段上出现断裂。从地域上来说,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地方学者的自发行为,尽管后来也召开过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研讨会,但研究视野限于本省、各管一片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从时段上来说,关于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的研究也泾渭分明,能够打通不同时代的研究成果较少。地域上、时段上断裂,不仅导致古道研究的格局始终无法打开,也导致学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迟迟未能达成共识。最后,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壁垒,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遗产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在古道研究上各自摸索,彼此独立,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较为罕见,历史文献资料、语言学资料、田野挖掘和调查资料之间缺乏互证,难免有盲人摸象之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引入“一带一路”的新视野,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以及以文献整理为核心、多学科综合的新方法,全面更新西南茶马古道研究的理路和范式,推动该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二、“一带一路”的新视野

2010年,国家文物局提出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申报世界遗产的战略规划,政策层面对于西南茶马古道的关注度不可谓不高。然而十年过去,同为文化线路遗产的陆上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早已申遗成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鼓浪屿和泉州分别以“历史国际社区”和“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名义成为世界遗产,甚至提出时间更晚的中俄万里茶道也已进入《中国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2019)》,相比之下,西南茶马古道的申遗之路依旧崎岖。

申遗工作的曲折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困境。长期以来,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不够科学、系统、规范,不仅阻碍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也使该线路遗产的申遗和保护工作缺乏坚实的知识基础。目前公开出版的西南茶马古道相关著作已多达上百种,然而其中多数是以“考察”“亲历”“纪行”“风景”“故事”为题,学术性专著极少;已发表的论文中,带有“考察记”“游记”“景观”等字眼的非专业性文章也随处可见。确如一些学者所说,“茶马古道已经从学术概念成为声名远播的文化符号”^[35](P42),引发了社会各界尤其是茶业、旅游业、文化娱乐业的广泛关注;但也恰恰是这些关注使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始终游走在学术和消费、娱乐的中间地带。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要突破瓶颈,纠正以往的游记化、感性化倾向,就需要以“一带一路”的新视野来引领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一带一路”的新视野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借鉴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式,汲取研究经验。丝绸之路研究,特别是陆上丝绸之路研究已逾百年,学术成果丰硕,研究经验丰富,作为同类廊道遗产的研究范本,值得借鉴。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或者说较重要的研究经验,大致有三点。首先是拥有整体概念框架和研究格局。陆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于1877年由李希霍芬提出,与西南茶马古道相似,学界当时对这条线路的认识也并不全面,此后同样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陆上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东西方交流的干线,如李希霍芬所说,昆仑山“北坡有一条民族交往的大道,从中亚出发穿越沙漠和高山,经甘肃到广袤富饶的西安府的大道。这里曾多次发生高级的文化,艺术与科学十分繁荣”^[36](P618)。它既不是某一条古道的支线,也不仅仅是一城一地的文化遗产,而是拥有完整框架和宏观格局的线路,这决定了它的研究者即便只取一隅作个案分析,也会以线路的整体概念为思考起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研究的割裂。其次是以扎实的文献研究为基础。以1903年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出版为起点,陆上丝绸之路相关的传世文献研究便拉开了序幕;同样在20世纪初兴起的敦煌学及之后的吐鲁番学,又掀起了出土文献研究的热潮。陆上丝绸之路相关传世文献的整理、考释和分析,以及相关出土文献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一直延续至今,为进一步的线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最后是综合多学科方法,使宏观分析与微观考察相结合。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既有文献学、考古学搭建骨架,又有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交通史角度的探索充实其内涵,还有众多区域研究、个案研究成果作为支撑,真正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这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能够做到深入细致、覆盖面广,既避免空泛,又不至于支离破碎。以上三点,既是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先进经验,又对应下文将要阐述的“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和“以文献整理为核心、多学科综合的新方法”。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的新视野,是拓宽西南茶马古道研究思路、推进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肯綮所在。

第二个层面是融入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外交流史研究框架。前文提到西南茶马古道研究曾一度依附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而从南方丝绸之路的框架下剥离出来,是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迈入正轨的重要一步。不过,强调线路的独立性不等于线路研究的孤立封闭,甚至可以说,使西南茶马古道成为独立概念,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是为了更好地厘清它与丝路系统之间的关系。历史上中国的对外交流具有整体性。一方面,每一个道路系统都有其明确的指向,陆上丝绸之路通往西域、中亚,海上丝绸之路通往南海、印度洋沿岸,南方丝绸之路通往东南亚,西南茶马古道通往西藏和南亚;另一方面,这些指向不同的道路系统之间又是广泛联系的,通过各条延伸出去的支线,西南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将距离遥远的

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使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连线成面、浑然一体。西南茶马古道与丝路系统的连接,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比如,被称为“麝香之路”的古代贸易通道沟通了西藏和中亚、西亚地区,其具体路线实际上就是西南茶马古道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组合;再如宋代佛教僧侣往返于内地和南亚之间,也兼取陆上丝绸之路和西南茶马古道,以形成路线上的闭环。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说明西南茶马古道是一个开放的道路系统,它与陆上丝绸之路等古代道路系统密切相关。正因如此,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只有拥抱“一带一路”的新视野,融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外交流史研究框架,才能获得更为全面宏观的认识。

第三个层面是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中突出现实关怀。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说,丝绸之路横绝大漠,海上丝路穿越海洋,西南茶马古道逾跨山岭,这些道路全都蕴藏着古代中国人与世界各族人民和平交往、互通有无的成功经验,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正是对这些成功经验、宝贵精神的理论总结和发扬光大。因此,在新时代研究西南茶马古道,离不开“一带一路”的广阔视野,借助这一视野,有利于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叙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中找准当代定位,提升实践价值。

三、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

上文说到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存在地域和时段上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又明显阻碍了研究格局的拓展,导致学界始终未能将古道研究提升到中华文明研究的高度。未来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需要摆脱这种断裂的困局,以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为相关研究领域注入活力。

大地理,就是要以西南茶马古道为切入点,关注其途经的整个西南地区及部分西北地区,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就是陕、甘、青、川、黔、滇、藏七个省区。在早期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中,云南学者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从古道遗产保护的推进来看,云南丽江等地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反映了云南学界在西南茶马古道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存在地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四川、西藏等地的学者开始关注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但学者往往立足于本省区,又使得不同省区之间彼此分割、难有整体观照。仅以明代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研究为例,肖文清等人重点讨论了明代河湟洮岷地区的茶马贸易情况^[37](P61-65);王兴骥则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贵州^[38](P62-65);申旭的研究从明代下延至清代、民国,但地域上仍以云南为中心^[39](P46-51)。各地学者立足于本省区,固然可以使研究工作更加细致,但在地区本位思维下不免得出一些片面的结论。比如关于西南茶马古道的主导性力量,不同地区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云南学者着眼于滇藏线,往往片面强调古道的民间性、地方性,相对忽视历史上国家主体对古道的全局性经营治理,认为西南茶马古道是马帮走出来的商路,要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汉文化中心主义等传统观念^[40](P103);陕西等地的学者则以青藏线和川藏线的官修正史资料和茶马管理机构遗存为依据,指出茶马古道的形成离不开宏观层面的国家行为因素^[13](P114)。实际上,作为线路众多、历时悠久、牵涉族群广泛的古代贸易和文化通道,西南茶马古道的面貌必然是驳杂多样的,民间性、地方性与官方性、全局性也一定是共存的。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者不应过于强调任何一个侧面,而是应该打破地区本位,以大地理的思维站在全局高度去考察,力促学术共识的形成。

大历史,意味着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要弥合时段上的断裂,关注古道在隋唐至近代一千多年的历史跨度里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特质。以往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之间的界限比较分明,不仅介于其间的金元时期几乎无人问津,将唐代至清代的古道发展状况统合起来作长时段讨论的成果也较少。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尝试打通断代,如王晓燕的《官营茶马贸易研究》一书^[41],邓前程的《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42](P117-123)、张永国的《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43](P34-40)等文章,都进行了较长时段的梳理,并得出了一些规律性

的结论。不过,这些通史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茶马贸易领域,对于古道本身的历史演变,以及古道上的政治交往、宗教传播、文化交流与演化等问题涉及较少,仅有的一些讨论也比较粗疏。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中的很多问题,比如历代王朝对于古道的经营及其演变趋势、藏传佛教与古道的关系、古道对于沿线民族关系的塑造等等,都是由于大历史思维的缺乏一直悬而不决,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进行较长时段的观察和深入细致的分析。

大文明,是指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应当提升到中华文明研究的高度,着力探索古道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联系。这种文明研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研究古道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二是研究古道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方面的贡献。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西南茶马古道一方面由于其沟通内地和藏区的功能,促进了汉文明和藏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另一方面由于其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功能,也促进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两大历史地理板块的整合。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方面,西南茶马古道主要是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在隋唐以前,这两大文明之间多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进行沟通,西南茶马古道则开启了文明沟通的新阶段,不仅使之更加便利,也为之增添了青藏高原的文明因素。有了西南茶马古道的连接,青藏高原便成了中国与南亚之间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交往的中转站,既塑造了青藏高原的文明面貌,也促使它形成东向发展趋势,从而改变了整个亚欧大陆东部的文明格局。西南茶马古道参与下的这种文明整合与交流的模式,以和平共处为主要基调,在世界历史上较为罕见,今后的古道研究应当充分讨论这一模式的内涵和特征,挖掘它的价值和意义,讲好古道上的中国故事。

总而言之,在近三十年来的学术基础上继续推进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使之更上层楼,必须具备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西南茶马古道研究的宏观目标,也不能局限于研究古道本身,而是力图揭示中国西南大历史、大地理和大文明的整体格局。

四、以文献整理为核心、多学科综合的新方法

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涉及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遗产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迄今为止各学科方法在古道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却较为少见,这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语言学是茶马古道早期研究的重要方法,语言学者通过考察“茶”在不同语言和方言中的发音来分析历史上茶叶的流通和贸易状况,极大地开拓了古道研究的语言学路径^[44](P12-16),但同时也存在以词证词、脱离历史现场等问题。再如一些考古发现更新了学界对古道的认识,但将这些考古发现同传世文献进行对照的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却比较少。

比学科壁垒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古道研究的文献基础不足。目前一些相关研究还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层面,无论是对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的挖掘都不深、不透,导致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虽然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却缺乏基础性的文献支撑,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献研究的缺位不仅使得西南茶马古道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具体路线走向、兴衰发展脉络、主要贸易内容等尚未厘清,也给进一步研究的开展、遗产的保护与申报等工作造成了较大的不便。聚焦文献是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转型中最为迫切的一步,它能够让古道研究落到实处、找到牢固的支撑点,而扎实的文献研究离不开文献资料整理这一基础工程。以往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虽也部分触及了文献领域,但多数是依靠田野调查得来的民间文献,官方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资料挖掘得相对较少。中国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献体系详细记载了本国历史、中外交流史乃至一些邻国的历史,其全面性和延续性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要在整理民间文献的同时,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这一历史文献体系,同时充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进行对照研究,借鉴丝绸之路研究的成功经验,将西南茶马古道研究推向学术化、深入化。

因此,今后西南茶马古道领域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以文献整理为核心,综合运用文献学的分类编目、文献计量、版本校勘,历史学的考据法、口述史、比较史学,以及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方法,考古学、人

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法等多学科方法,进行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坚持这一方向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本领域的进展,也在于为当今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路学,探索一种具备可行性的研究模式。

可喜的是,近年来在“一带一路”视野的引领下,学界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不仅应当摆脱地域、时段上的限制,还要以文明研究的眼光面向国际,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形成协调机制,通过中外学界的共同努力,推动西南茶马古道保护和申遗工作。认识到这一领域不仅要夯实文献基础,还要注重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2016年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承担了“云贵川茶马古道管理现状与保护对策研究”课题,希望以此提升西南茶马古道研究的整体性。2017年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发起,云南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多家省级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茶马古道——八省区文物联展”,使古道研究在宣传上逐渐具有了全国性课题的气象。2020年,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在茶史、茶叶经济、茶文化等领域已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联合西南地区茶马古道研究阵地及专家学者,以川藏、滇藏、青藏三条线路为抓手,以文献资料整理、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交流研究为重点,成功申报了“‘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为打破相关研究的各种限制提供了又一契机。接下来,西南茶马古道研究界还需要更进一步整合资源,创办全国性的学术期刊作为研究阵地,组建遗产保护和申报智库队伍,推进研究领域的长远发展,使西南茶马古道这一媲美丝绸之路的人类文明交流发展大通道获得应有的知名度和关注度,凸显古道在边疆治理、民族融合、文化互动方面的重要意义,为引导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提供学术支持。

参考文献

- [1] 木霁弘.茶马古道考察纪事.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 [2] 格玛明珠.超越——茶马古道考察记.云南大学报,1991-01-15.
- [3] 木霁弘.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 [4] 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中国藏学,2002,(3).
- [5] 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4).
- [6] 孙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12,(1).
- [7] 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向边疆塞外的传播.人文论丛,2016,(2).
- [8] 张海超.南诏大理国与吐蕃及东南亚地区的茶叶贸易初探.农业考古,2020,(2).
- [9] 陆离.唐宋与吐蕃间的西北茶叶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10] 杨海潮.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青海民族研究,2010,(3).
- [11] 赵国栋.茶马古道遗产:西藏昌都茶叶贸易的历史、文化与启示.民族论坛,2021,(1).
- [12] 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茶马古道”文化简论//李子贤.文化历史民俗: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文化论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 [13] 李刚,李薇.论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联系及历史地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 [14] 张洁.茶马古道线路兴替:基于官办茶马贸易的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21,(4).
- [15] 凌文锋.茶马古道与“牵牛花”网络——茶叶与滇藏川的文脉化研究.云南大学,2012.
- [16] 陈保亚,袁琳.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茶马古道——基于chaj读音分布的语言地理学证据.思想战线,2015,(1).
- [17] 刘礼堂,陈韬.西南茶马古道:汉藏交融的千年大通道.光明日报,2021-01-25.
- [18] 贾大泉.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1).
- [19] 陈泛舟.北宋时期川陕的茶马贸易.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
- [20] 武沐,郭翔.明朝茶马贸易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2).
- [21] 陈海龙.清朝官营茶马贸易的衰亡.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 [22] 李旭.论大西南马帮精神.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 [23] 汤开建.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4] 周智生. 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藏客”起源探析. 西藏研究, 2009, (5).
- [25] 杨福泉. 略述丽江古城及茶马古道上的“房东伙伴”贸易.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5, (12).
- [26] 张科. 藏传佛教与安多区域史研究. 江汉论坛, 2017, (3).
- [27] 刘礼堂, 谭昭. 云南丙中洛乡多元宗教的碰撞与融合——以基督教为例. 红河学院学报, 2018, (1).
- [28] 木霁弘. 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线路.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20.
- [29] 杨福泉. 茶马古道研究和文化保护的几个问题. 云南社会科学, 2011, (4).
- [30] 王丽萍. 文化线路与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 (7).
- [31] 喇明英, 徐学书. 四川茶马古道路网系统及其文化与旅游价值探讨. 社会科学研究, 2011, (4).
- [32] 袁晓文, 陈东.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及开发中的民族问题研究. 思想战线, 2015, (3).
- [33] 李飞, 马继刚. 我国廊道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以滇、藏、川茶马古道为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6, (2).
- [34] 单霁翔. 保护千年古道, 传承中华文明. 四川文物, 2012, (1).
- [35] 周重林, 凌文锋. 茶马古道 20 年 从学术概念到文化符号. 中国文化遗产, 2010, (4).
- [36]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 李岩, 王彦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37] 肖文清, 武沐.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青海民族研究, 2009, (4).
- [38] 王兴骥. 明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贸易——以贵州为例.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6).
- [39] 申旭. 茶马古道与滇川藏印贸易. 东南亚, 1994, (3).
- [40] 杨海潮. 茶马古道: 地方性的民间视角. 思想战线, 2016, (6).
- [41] 王晓燕. 官营茶马贸易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 [42] 邓前程. 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 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 思想战线, 2005, (3).
- [43] 张永国. 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 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 2006, (2).
- [44] 陈保亚, 杨海潮, 汪锋等. 滇藏古道上的樊人(孤人)调查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

Research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Under the Vi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Retrospect,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

Liu Litang, Feng Xinyu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has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defini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scope,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derivatives, relative archaeology,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Some problems have been exposed. For example, the research is not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fracture occurs in region and time period, and barriers exist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establish a new thinking mode of grand geography, great history and big civilization and use the new method of multi-disciplinary synthesis with literature arrangement as the cor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highlight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literatur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 收稿日期 2021-10-15

■ 作者简介 刘礼堂, 历史学博士,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 湖北 武汉 430072;
冯新悦,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责任编辑 桂 莉